《命运的诅咒》增订纪念本

贫富悬殊的背后

中国经济增长狂热现象解读

黎鸣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命运的诅咒》增订纪念本

贫富悬殊的背后

——中国经济增长狂热现象解读

黎鸣／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的诅咒/黎鸣 著. 2版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1
ISBN 7-5087-0226-3
Ⅰ.命… Ⅱ.黎… Ⅲ.①思想史－世界－近代
②思想史－世界－现代 Ⅳ.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0630号

书　　名:《命运的诅咒》增订纪念本

著　　者:黎　鸣
责任编辑:张　承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编: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新龙大厦
电话:66051698 电传:66051713 邮购部:66060275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mm 1/16
印　　张:22
字　　数:306千字
版　　次:2007年1月第2版
印　　次:2007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87-0226-3/B·69
定　　价:25.00元

自　序

笔者《三问》(问人性、问天命、问历史)系列第二部，《问天命》一书，经过八年艰难的琢磨，终于可以竣工了，然而笔者并没有感到轻松，《问历史》的漫长的路途尚等待继续跋涉。在六年前出版的《问人性》一书中，笔者提出了一种探索人性的基本理论，并按照这种理论，对于中国人的人性、西方人的人性以及它们不同的历史命运等有关问题，尽可能地作出了笔者自己的解析，那么，在此《问天命》一书中，笔者想告诉读者一些什么呢?未来，关于新的世纪的未来。未来对于全人类来说，并不一定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或许，更大的可能性会是灾难。正是因此，《问天命》的副标题是：21 世纪，人类的精神危境。

“问天命”，顾名思义，问“天”、问“命”，或合起来问“天命”。中国文字的“天”是(第)“一”“大”，事实上相当于中国人的上帝，只不过，中国人的这个上帝却没有人格，也谈不上是一个神。那么“天”究竟是什么呢?古代中国人不作兴定义，只要你抬头看看就知道，那个在白日里现出蔚蓝色、不时骤起变幻的风云，而在夜晚却漆黑一片、或不时闪烁着寒星的亮光的，就是天。它永远笼罩着你，它始终注视着你，它似乎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一切，可是你却对它茫无所知。可以说，它就是你永远不可知的一切，然而它却永远似乎知道你的一切。用今天人们的话语来说，即：它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在时时处处限定任何个人的生命存在的“绝对”和“必然”。

“命”是什么呢，命是“人”“一”“叩”(首)，也即接受命令、执行命令，当然，也可能抗拒命令；又可转意为听从命运、实现命运，或者抗拒命运。“天”对于人来说，是绝对的、不可知的，但“命”对于人来说则不必完全是绝对的，也不必完全是不可知的，因为毕竟它尚要求人们自己去执行、自己去实现、自己去生存，甚或自己去抗拒。所以“命”，终究还给人留下了一点点主观能动的有限的可能性。天与命合在一起即为“天命”，我把它理解为人类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在长期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强大的“惯性”，这种“惯性”对于任何个人来说，它的确是一种

难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绝对的”、“必然的”力量，但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精神性的人类来说，这种几乎“绝对”、“必然”的惯性力量，在未来的时间里却并不必是绝对不可改变的，也即是说，人类想要改变它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们不要忘记，在数亿年的漫长的过程中，自然界的进化，例如植物的进化、动物的进化、人类的进化，乃至人类文明的进化，其前进的方向恰恰都是朝向最低的发生概率的，也即是按照“负熵增原理”的方向前进的；虽然近来的社会问题研究，人们总喜欢看统计数字的大多数，并愈来愈为这种“大多数”所局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是真正的“麦克斯韦妖”，他们总是按照“负熵增”的方向增进自己的有序性，而不是相反，服从无机物遵循的“熵增”原理绝对地走向寂灭、走向死亡。

正是凭着这样一种信念，笔者才有勇气完成这本书。否则，当面对今天人类中如此许多衰败的迹象，恐怕笔者就只能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就像一些存在主义者或一些精神分析主义者那样，陷入对人类前景的极端的悲观，甚至绝望。

不管怎么说，人类的命运还是有一部分是由人类自己掌握着的，所以，人类除了充分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之外，现在看来，该是特别要求真正认识人类自身的时候了。

前面说到，天命对于人类来说，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在自然和社会中其自身历史的惯性，而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属于它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所以，本书取名《问天命》，首先即在回顾历史，这正是本书前两部的主题，其中又特别在于回顾20世纪刚刚过去的历史和近现代以来逐渐占据了人类文化重心的西方思想的历史，以此力求从中探索到其内在的惯性力量以及方向的所在。

在书中笔者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人类历史的惯性在今天的表现，即是全人类“现代化”的合流，可是这种“合流”所带给人类未来的命运，与其说是人类共同的幸福，不如说更大的可能性是人类共同的灾难，甚至自我毁灭。 不管人们用什么语言去为自己争论或辩护，今天人类的所谓“现代化”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西方化。西方人的科学技术，西方人的思想理论，西方人的生活习俗，目前正以不可阻挡的态势传遍全世界。它们既仰仗于西方不可一世的武力和雄厚的金融资本，更凭借着科学、信息网络等技术的优势，这是不可辩驳的近现代历史的真实。问题在于，这种真实的未来的前景将会是什么呢？人类跨越2000年进入新的千年世纪，将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人类呢？ 在本书的第一部，笔者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的历史进行了命运的质询。笔者认为，一切的根源均在于，人类在近现代愈来愈只重视理性精神，也即只重视古希腊传统的人类求知原精神，并使之变成绝对化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理性主义，而在此过程中的同时，却又愈来愈毁弃了人类的另外两种原精神，即希伯来传统的信仰原精神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仁爱原精神。丧失了信仰原精神和仁爱原精神的现代人类(当然首先是西方人类，且特别是美国人类)，实际上即是丧失了一切道德情感基础的肉感的政治经济动物，这些政治经济动物在全世界大量制造种族分裂、民族分裂、阶级分裂、家庭分裂、性分裂，最后是人类全面的悲惨的精神人格的分裂。正是在这种种不可阻挡的加剧的分裂之中，造成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空前、死人最多的世界大战，造成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空前、手段最卑劣的政治迫害，造成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空前、贫富极化现象最严重的经济狂热，造成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空前、道德最败坏的文化堕落，造成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空前、情感最冷酷的变态家庭，造成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空前、精神最失落的动物化人格，造成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空前、形势最严重的生态破坏……这即本书的第一部《命运的诅咒》，以及第二部《道德的沦陷》的内容。

在第二部的末尾，笔者试问：21世纪人类向何处去？笔者呼吁全人类生命意义的革命。

在第三部《悲剧的源流》之中，笔者对人类20世纪悲剧的源流，特别是对影响了全人类的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史进行了纵深的追索。笔者的答案是沉重的。西方文化传遍全世界愈是达到它的极盛，便愈是加速其走向衰亡的开端。十六七世纪兴盛起来的思索人类命运的西方哲学，到了21世纪，除了继续高扬其造孽的绝对的理性主义之外，实际上已经不中用了，已经死了。走向21世纪的人类除非兴起“人学”以自救，否则，将只有死路一条。在第三部的末尾，笔者提出了三大人学问题。

第一大人学问题是马克斯·韦伯问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精神首先兴起于欧洲新教伦理地区？这是一个涉及人类信仰原精神的问题。

第二大人学问题是尼达姆(李约瑟)问题，即：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精神)首先兴起于西欧？这是一个涉及人类求知原精神的问题。

第三大人学问题是笔者本人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人类社会愈是按照西方文化模式走向“进步”，人类对待自己的同类却愈是表现出冷酷无情，甚至残忍凶狠，这样的“进步”究竟要把全人类推向何处？这是一个涉及人类仁爱原精神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特别在2001年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和2002年三四月发生的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凶残的杀戮事件中获得了新世纪(21世纪)象征性的可悲的印证。

在本书的第四部《西方哲学死了》之中，笔者尝试为人类生命意义的革命和求解

第三大人学问题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思考。笔者郑重宣告，西方哲学已经死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切纯粹出自西方人的思考，他们可以继续推进人类中更广泛更深刻的分裂，却无法改变人类这种不断走向分裂的命运。当代美国的思想家们(如亨廷顿、福山等)仍在继续高举他们长期以来获胜的理性主义大旗，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则在运用解构主义的办法无可奈何地向人性原欲和原恶的本能复归。西方人的思维方法，包括现在正被人们赞扬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方法，都已被他们自己的顽固的传统彻底套牢，他们不可能会有其他的思维方法。21世纪以后的“人学”必须由东方人和西方人联手合作，共同参与创造。仅仅西方人的二元论的逻辑思维方法不仅不可能改变人类的命运，而且更加速人类命运的恶化，未来人类世界的希望在于多元论的逻辑——位格思维方法的诞生和推广。位格思维方法的古代典型即中国人传统的“阴阳五行”，然而单纯的“阴阳五行”思维方法早在中国汉代末期就已经停滞了、僵死了，但其中的合理性却终于有可能在未来的新世纪激发起人类新的创造的热情，至少笔者是如此认为的。笔者在创造“人学”的过程中即受到了“阴阳五行”的思维方法的有力的启迪，尽管笔者真正提倡的不是“阴阳五行”，而是“阴阳三行”。东方的“阴阳三行”的位格思维方法加上西方的二元论的逻辑思维方法将有可能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的“人学”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将有可能为改变人类在新的千年世纪不幸的命运而提供有效的思维成果。至少，这是笔者的一种坚定的信念。正是凭着这种信念，笔者才有可能为读者提供拙著：《问人性》、《问天命》、《问历史》以及最终可能的《人学全书》。读者能否接受我的这种思维呢？我可以等待，即使遥遥无期于九泉之下。在我，我的所为，不过是勉力尽自己的一点人事而已。

此外，有一事必须预告读者，由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问天命》一书虽四年前即已竣工，却出版无门。这促使笔者把其中结论的部分单独结集，以望先期出版，此即正在发行的《西方哲学死了》一书。今日幸运，《问天命》全书也可以出版了，为避免太多重复，故把《西方哲学死了》仍作为第四部，而与前三部合为一书。然而，由于系统性的缘故，书中仍不得不保留少量章节的重复，在作者、出版者，这均为不得已之事，望读者谅解。为此，第三部附录中将列出原书原始的目录供读者对照参考。

黎　鸣

2004年1月24日于北京寓所

目 录

上篇 理性主义的狂妄与罪孽

第一章 理性精神与理性主义……(3)
第二章 理性精神蜕变的历程
——笛卡儿—康德—黑格尔—尼采，上帝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历程…(24)
第三章 进化论与西方种族优越论……(73)
第四章 意识形态论与人类理性的分裂……(96)
第五章 精神分析学与理性主义的终结……(117)
一 潜意识论与理性的伪装……(119)
二 泛性论与家庭理性的崩溃……(133)
三 人格自我分析与理性主义的终结……(182)
第六章 相对论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结束……(196)
第七章 人类的精神性是如何丧失的……(221)

下篇 20世纪历史的“空前”与“最”

第八章 种族(民族)主义与世界战争……(237)
第九章 意识形态对抗与铁血政治……(262)
第十章 经济增长狂热与贫富极化现象……(280)

“哲学乌鸦”黎鸣（代跋）……苍狼（341）

上 篇

理性主义的狂妄与罪孽

对于大多数乐观的理性主义者们来说，20世纪在行将结束之际留给人类的决不是什么教训，而应是极其辉煌、伟大的人类理性主义的成就：愈来愈高、精、尖的科学技术、愈来愈丰富多彩的创造性的物质成果和愈来愈便捷、舒适、自由的人类享乐、泄欲的渠道和方式……总之，现代人类的所有这一切成就足以让今人狂妄地傲视一切古人。古人即令在梦中也决不会有可能想象到今人神奇的生活。古人能想象到今人相隔万里之遥都可随时听到亲友的声音，甚至看到他们的笑容吗?古人能想象到今人仅仅数个小时即可飞越地球上千山万水所容纳的巨大空间吗?古人能想象到今人竟能够登上月球的壮观情景吗?古人能想象到今人不出家门就可以欣赏到所有的戏剧、歌舞、影视等等表演艺术的愉快和欢乐吗?古人能想象到今人完全自动化的工厂生产吗?古人能想象到……如果用今人信息计量的方法来表达20世纪人类科学理性的进步，那么可以说，20世纪这一百年中人类所获得的知识信息的总量一定远远超过了过去一千年，甚至一万年的全部总和。这样说决没有半点夸张。仅仅人类在20世纪中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就足以表明这一点：放射学、原子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自动控制理论、飞机、火箭、人造卫星、宇宙航行、人类登上月球、激光理论、超导理论、夸克理论、宇宙爆炸理论、基因理论、生命密码的解读和创造性的拼接……总之，20世纪人类的科学技术成就简直无法一一枚举，它们为人类带来的福利也同样是难以一一枚举。自然科学技术是现代人在一切古人面前

最值得夸耀的理性领域，除此之外，便是社会的科学管理的领域，该领域包括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人类社会的运作。但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成就往往并非那么显得纯粹骄人，甚至总是免不了出现某些巨大的遗憾。不像自然科学的成就，能够经得起方方面面的推敲(事实上，自然科学成就也同样不是那么纯粹无害于人类)。

然而，目光深邃的人类思想家会发现，人类的理性愈是膨胀，它的阴影也同时变得愈大。理性成就表现得越是辉煌，它给人类带来的黑暗也越是令人恐慌。大量的事实证明，人类的“理性”并不总是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人类决不可能仅仅靠“理性”生活。

在20世纪，人类理性愈来愈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主义”，人类的生活也相应愈来愈变得失去了灵性。人类自身愈来愈变成了自己手中的物质工具和机械。人与人之间，愈来愈变得隔阂、冷漠、无情无义；人们的宗教道德丧失了，亲情恩义丧失了，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情人、师生朋友……总之，一切过去曾经令人感到幸福温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都在权力、金钱、消费狂热和欲望满足的狂潮中融化了，消解了。社会的“理性”进步并没有相应带来人类奔向幸福目标的进步，而是相反，个人愈来愈感到焦虑、孤独、恐惧、痛苦。与人对人造物(权力、金钱、知识)的热衷形成尖锐对照的是，人对人的恩义、情感、关切已经完全丧失，变得极其冷漠，甚至冷酷、残忍。不仅仅是对于陌生人，即使对于自己亲近的人——父母、夫妻、子女、兄弟、姐妹、情人、朋友、师生，也依然是如此，甚或还更有过之，愈是亲人朋友愈是表现得冷酷。君不见当下社会中的愈演愈烈的家庭暴力，以及市场交易之中杀亲宰熟的一幕幕人间惨剧?这是为什么?人们曾经认真想过吗?现在我要告诉人们，一切的祸害都在当代理性主义的狂妄，都在市场化社会的极化，都在“现代化”之眼的盲目，都在经济增长需求的狂热的专注。西方人的“理想”一旦变成了全人类的“理想”，实际上也就是全人类的大灾难降临的时代的到来。

人是有血有肉的动物，同时也更是有情有爱的动物。可是理性是什么?理性并不包括这一切，理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恰恰排斥这一切。下面我们便来剖析一下“理性”。

第一章

理性精神与理性主义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结晶。西方哲学界称16世纪为“冒险的时代”，称17世纪为“理性的时代”，称18世纪为“启蒙的时代”，称19世纪为“意识形态的时代”，称20世纪为“分析的时代”。实际上，从16世纪到20世纪，在这五百年中，西方文化模式及其向全世界的扩张，整体上即显示了人类理性和理性主义从其诞生、成长、壮大，直到僵死的全过程。这也是西方哲学从它的古希腊形态的复兴、成长、壮大直到最后终结的全过程。到了20世纪末，西方哲学也就完结了它对于人类历史的全部使命。在人类的思想界，它将不得不清出自己曾经占据过的中心地盘，而让位于在21世纪必将兴起的“人学”。

在西方的近代，人类理性的兴起与人类信仰的衰落几乎是同时或连带着发生的。

在西方的近代，人类理性的兴起与人类信仰的衰落几乎是同时或连带着发生的。如果我们把理性看作是人类原精神之一的求知精神的外部表现的话，那么，作为另一种人类原精神之一的信仰精神即体现为西方人对基督教宗教的信仰，对惟一神上帝的信仰。

从公元5世纪欧洲西部罗马帝国的崩溃开始，即逐渐形成了西欧基督教教会的神权与世俗王权的分裂和并立。在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这二百年中连连发生的由教皇和教会发起的(总共8次)十字军东征，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在人们的心中，却大大树立和巩固了教会和教皇的权威。在一些时间里，甚至连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得不屈尊于教皇的威严之下。然而，权力的分裂，也正是整个以暴力为基础的权力机器，或官场机器的衰落和分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在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这将近整整一千年的中世纪中，可以说即是西方人类的信仰由兴起、成长、壮大到衰退、死亡的全过程。在中世纪后期，教会对人们的思想的专制是极其严酷和残忍的。13世纪由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正式设立的“宗教裁判所”，以镇压“异端”和“异教徒”为名，竭力扼杀当时一切敢于具有不同思想的学说和思想者，查禁和销毁一切有关的书籍，秘密审讯和严刑拷打具有创新思维的思想者，对他们处以流放甚至火刑。当时的被迫害者数以万计。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和天文学家布鲁诺(1548—1600)即是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的。

在中世纪的信仰的时代，人们被引诱追求天国的幸福，而轻慢了尘世的幸福。基督徒认为，尘世的生命只不过是为更伟大的未来的生命作好准备，而人生中的种种苦难则不过是对人的磨炼，以此洗涤人们从祖先继承下来的原罪。这简直是一项超人的工作。为了成功地经受考验，人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基督徒为此必须行善，因为这是上帝所要求的。人们对死后的恐惧和希冀耿耿于怀，这在客观上却有助于抑制人们在社会中为所欲为作恶的动机。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宗教信仰(当然信仰不必只是宗教的，还可以有其他形式)在历史上的确起到了相当多的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有益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宗教对大多数善良的信徒的愚弄同时却助长了教会中那些权力控制者的作恶的野心(正如中国古代儒家圣人所宣扬的仁爱精神被专制帝王和官僚们用来掩饰他们的作恶的野心一样)。正是因此，中世纪的哲学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只能是宗教信仰的婢女。

欧洲的中世纪是古希伯来人的信仰精神(但已经有了权力的变形)凌驾于古希腊人的求知精神之上的时代，也即信仰超越理性的时代。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把古希腊哲学(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改造成了完全僵化的形式。古希腊的辨证法已经丧失了生命，只留下了僵硬的形式逻辑。这时候的理性只有在能够支持基督教信仰的场合才可能获得合法的存在。理性完全为信仰(严格地说应该只是宗教信仰)服务。然而，一旦信仰的问题受到了经验所支持的理性

中世纪宗教信仰对西方人类理性的压抑使西方人处于思想极其晦暗的时代，这种晦暗甚至超过了古代专制政治下的中国。这构成了李约瑟认为中国在15世纪之前的科技成果为人类服务的方面比西方人更有效的重要证据之一

的忤逆之时，理性就必须自觉后退。例如关于地球的年龄。《圣经》的计算是5700多年，地质学家则认为不下于40亿年。这两者谁需要修正呢?在中世纪，无疑应是后者。中世纪宗教信仰对西方人类理性的压抑使西方人处于思想极其晦暗的时代，这种晦暗甚至超过了古代专制政治下的中国。这构成了李约瑟认为中国在15世纪之前的科技成果为人类服务的方面比西方人更有效的重要证据之一。虽然，实际上在这里无疑还会有某些更复杂的因素，例如中国文化人多数并不关心自然领域的理性问题，而更集中精力关心“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的世俗的道德“学问”。

由于教会思想的僵化和神权统治的黑暗腐败，在中世纪后期，传统的社会终于出现了难以弥缝的内部分裂。加上城邦和商人阶级的崛起，火药从东方的传入冲破了传统贵族庄园的深沟高垒的地方割据，活字印刷术的推广(以及早在公元9–10世纪即从东方的中国传入的造纸的技术发明和生产)活跃了通过地区方言文字的思想传播，指南针的运用有力地推动了远距离的航海冒险活动和接踵而来的海外新大陆的地理大发现……等等，中世纪后期(具体说即16世纪)在欧洲形成了一种易于激起连环发生的正反馈现象的社会—文化的作用机制，这是一种全人类文化大交汇的正反馈的激变现象，它绝对不仅仅是西方人类的单方面的文化现象。严格地说，在这种文化的激变之中，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文化素材都来自发生巨大文化变迁的西欧的外部：信仰精神来自中东的古希伯来人，而古希伯来人是忠实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求知的人文精神来自古希腊人，古希腊人同样是中近东古代文化的优秀的传承者；发动文化变迁的一些重要的物质文化素材则来自远东的中国，四大发明(造纸、火药、活字印刷、指南针)即是中华文明为近代西方文化革命所作出的不可或缺的伟大的贡献。可以反问一句，如果没有古代的埃及人、巴比伦人、希伯来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尤其是中国人以及他们为发生在西欧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所作出的前期的不可或缺的贡献，会有当今不可一世的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等西方人的先进的文化吗?人类中一切的文化现象的

只有文化思想上的最浅薄之徒才会贸然把一种文化现象的奇迹仅仅归功于某一个人种甚至某一个民族。

解释，都必须是针对文化机遇的解释。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也即时间的、空间的、信息的)机遇造就了人类中形形色色的文化，造就了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令人瞩目的伟大的文化奇迹，其中包括古埃及的金字塔，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古中国的万里长城、四大发明以及蔚为大观的连续三千年不变的中国伟大的人类官场化社会的文明体系，同样也包括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民主—自由的权力体系和科学技术的知识体系。只有文化思想上的最浅薄之徒才会贸然把一种文化现象的奇迹仅仅归功于某一个人种甚至某一个民族。而一旦某一个人种或某一个民族真是为他们的某一种文化的成就自负到了无视其他一切人类文化机遇的伟大创造力之时，他们的文化的极盛时代的衰落之期也就悄然而至了。因为命运女神永远只垂青于那些具有最开放的心胸和情怀的人类。

命运女神永远只垂青于那些具有最开放的心胸和情怀的人类。

曾经自诩为“中央之国”的中华民族虽然创造了奇迹般的伟大的人类官场化社会文明体系，然而更伟大的人类市场化社会文明体系的创造的使命却落到了遥远的西方人的肩上。当西方人躺在由他们在近五百年创造的伟大的人类市场化社会文明体系的僵尸上沾沾自喜之时，下一个更伟大，或许应该说更加空前伟大的人类情场化社会文明体系的创造使命难道还将会继续落在他们的肩上吗？

具体说，21 世纪人类的更新、更伟大的文化奇迹将在地球上的何方出现呢?仍旧会在西方吗?还是东方?还是南方?我看，在东方的可能性更大。当然，预测不是算命，应该有所根据，尤其是理论根据，也即对未来人类的文化机遇的运动的理论根据。我断言，这个理论的核心，决不会是现存的理性主义，决不会是现代西方的哲学，甚至不会是今天几乎令人盲目崇拜的科学；它应是当代人类对人性的真实的透视学，也即21 世纪必将兴起的伟大的“人学”。在讨论到人学之前，让我们先来审视一遍人类近代理性的结晶，也即西方的哲学，看看它是如何走向理性主义，也即它的终结之路的。

21 世纪人类的更新、更伟大的文化奇迹将在地球上的何方出现呢？仍旧会在西方吗?还是东方?还是南方？我看，在东方的可能性更大。

按照罗素在他的《西方的智慧》一书中的说法，从中世纪的文化衰退到 17 世纪的伟大的文化迁跃之间具有一个过渡时期，它是由四项伟大的运动连环造成的。这四项伟大的运动即 14 世纪首发

于意大利的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开始逐渐向北扩张到德国、法国和低地国家的伟大的“人文主义”运动；16世纪首发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创始于“奥卡姆的批判”，结果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和伽利略的实践理论证明的“实验科学”的运动。这四项伟大运动环环相扣的联合作用，一齐冲破了中世纪封闭思想传统的禁锢，开创了17世纪欧洲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并因此把全人类的文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即理性的时代，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人类市场化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个社会历史和逻辑的节骨眼上，马克斯·韦伯和李约瑟提出了他们的著名的人学问题。这两大问题都是与东方文化相比较之下的西方新文化模式的伟大创造。马克斯·韦伯要求证明，为什么市场化社会(实即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在西方新教地区发生；尼达姆(李约瑟)问题则要求证明，为什么人类近代科学理论反而在中世纪时期科学技术比之东方、尤其中国相对更落后的西方首先发生。在罗素看来，全部问题的秘密都包含在上述14—16世纪的“过渡时期”的四项伟大运动的环环相扣的联合作用之中。

在罗素看来，全部问题的秘密都包含在上述14—16世纪的“过渡时期”的四项伟大运动的环环相扣的联合作用之中。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信仰的时代，人们崇奉洗涤原罪的苦行主义，寄托希望于上帝救赎的来世主义，努力躬行靠教会为中介的集体启示主义。但到了17世纪的理性时代则不然，人们普遍倾向于否定原罪的乐观主义(享乐主义)，普遍重视世俗功利的现世主义，以及普遍赞同个人与上帝直接接触的个人主义。这与我们在后面关于“现代化”所总结的人类本性的快乐主义、社会属性的经济主义和精神属性的科学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现代化”是理性精神在当代的理性主义的极端表现。享乐主义、现世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现代化”的西方的人性本质，是近代西方文化模式的理性主义的价值核心，是西方人类的理性文化之根。这种根是生长在反对西方中世纪信仰时代的苦行主义、来世主义和集体启示主义的精神土壤之中的。

号称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的彼特拉克(1304—1374)是一位诗人。他选用了但丁曾使用过的后来成了意大利文学语言基础的托斯卡纳

方言，而不是使用专属于教会上层人士的拉丁文来写作诗篇，这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他首先提出用“人学”来对抗压抑人类精神的“神学”的理性主张。他写给他的心上人劳拉的十四行诗勇敢地歌颂了尘世间人类爱情的幸福，虽然他有时也迷恋洗涤人类“原罪”的苦行主义。

另一位文艺复兴的先驱薄伽丘(1313—1375)的名著《十日谈》，大胆地描述了一百篇内容上更粗野、更利己、更肉欲、更反教士，从而也更具有世俗人情味的故事。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更偏重于文学语言的世情描述和尘世情感的宣泄，那么，15 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则更偏重于理论的思考。人文主义者有时更热衷于运用拉丁文，但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如彼特拉克)相比，他们也更远离苦行主义和天启主义，他们更感兴趣于被古代希腊人视为研究人的各种学科，其中首先是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1469—1527)是“人文主义”学者的杰出代表。他用自然主义的手法描绘世俗的主题，刻画、表现人的真实的利己主义。人文主义者崇尚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尤其是讽刺喜剧。马基雅维里创作的《曼德拉戈拉》被称为是“意大利语言中最成熟和最有力量的剧本”。“马基雅维里在这个剧本和其他作品中表现了对人的本性的冷嘲热讽。他似乎深信，人人内心里不是流氓，就是傻瓜。他们的卑鄙和愚蠢的本性被一层修养和学问的薄薄的外衣掩盖着。”[①] 马基雅维里的两部政治哲学名著《君主论》和《罗马史论》更是使他的理性的精神获得了流芳(看你怎么看，也可能是遗臭)千古的名声。比之中国古代儒家文人的以德性劝导统治者施行仁政，马基雅维里却是劝导统治者直接诉诸罪恶与伪善的力量的结合。他以一个现代物理学者的理性的心态劝导统治者，要想掌握大权，就得残酷无情，是善是恶完全不在考虑之列。

在西方，马基雅维里开创了“理性”的政治哲学思考的先河，在其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的《政治篇》，在其后，则可

① 《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7，第 130 页。

以看到洛克(17世纪)和孟德斯鸠(18世纪)的发扬光大，进一步提出了制约与制衡的政治哲学原理。制约与制衡的政治构想是社会权力得以理性地发挥作用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因此而有了近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的“三权分立”，代议制的议会制度以及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等等民主——自由的社会理性的创造。

残酷无情与道貌岸然的两面派的初步的“理性”，在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韩非子时代就已经拥有了，但制约与制衡的理性，尤其“三权分立”、“代议制的议会制度”和“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民主——自由的社会理性则不然。这方面的成就恰恰是延续了三千年的官场化社会的中华民族所难以设想甚至不敢设想的，因此，也是始终欠缺的。中华民族的官场(权力场)只具有薄施伪善装饰的单纯的专制，中国人缺乏对权力本身的冷静的理性思考。不能不承认，这种敢于进行社会理性思考的精神恰恰是中国人在三千年的漫长的延续的历史之中从不曾培养起来并成为习惯的东西。

什么是精神?精神正是遍及于一个民族的世世代代、遍及于一个人成年后的一生之中的良好的思维和行动的习惯，人类的精神是人类生活经验的伟大的升华，是旦夕之间生长不出来的。人们现在把理性精神通常直称作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其实并不尽然。它根本是一种求知精神，是一种不断按照现实利益原则进行思考和行动的精神，是快乐主义、现世主义和个人主义联环起作用的精神。一般而言，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这样的理性精神。但现在中国人正在从西方全面把它迎来，可惜它已经不是最初的西方人的理性精神，而是已经变成了“现代化”形式的理性主义，它是偏向于享乐主义、经济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精神扭曲的变形。从理性精神到理性主义，不是人类求知精神的增长、丰富、充实，而是相反，是人类求知精神的扭曲、偏执、萎顿，或许更可能是堕落。

欧洲北方的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有荷兰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1469–1536)和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这两个人是亲密的朋友。

依拉斯谟相信理性是人类最美好的天性，只要准许理性的纯洁

残酷无情与道貌岸然的两面派的初步的“理性”，在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韩非子时代就已经拥有了，但制约与制衡的理性，尤其“三权分立”、“代议制的议会制度”和“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民主——自由的社会理性则不然。

什么是精神?精神正是遍及于一个民族的世世代代、遍及于一个人成年后的一生之中的良好的思维和行动的习惯，人类的精神是人类生活经验的伟大的升华，是旦夕之间生长不出来的。

从理性精神到理性主义，不是人类求知精神的增长、丰富、充实，而是相反，是人类求知精神的扭曲、偏执、萎顿，或许更可能是堕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